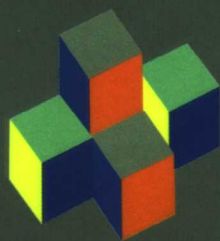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

[美] 保罗·肯尼迪 编

时殷弘 译
李庆四



世界知识出版社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

[美] 保罗·肯尼迪 编

时殷弘
李庆四 译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Copyright © 1991 by Paul Kenned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美]肯尼迪编;时殷弘 李庆四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ISBN 7-5012-2376-9

I.战… II.①肯…②时…③李… III.国际关系史 IV.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3081号

图字:01—2001—5235

书 名 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余 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 1/16 12½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5年1月第一版 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时殷弘 李庆四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道“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前言

下面各篇文章的首要目的，在于向读者展现“大战略”的历史实例研究，亦即展现对于这么一类努力的成败的评价，那就是欧洲各不同强国试图整合其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从而维护其长期利益。本书各章集中于考察欧洲大战略的某些经典实例，从古代罗马到丘吉尔的英国，从西班牙帝国到今日的苏联。与关于战略的许多其他研究不同，这些文章往往关注国家政策的非军事方面，如同关注其军事方面，并且在许多场合既关注大战略在战时的演变，也关注它在平时的发展。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更多地是当代性而非历史性的。它关系到目前正在展开的一种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所应实行的轻重缓急次序之恰当平衡，换句话说便是大战略。美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欧洲列强，但也必须形成将在一个复杂和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确保其长期利益的种种政策；因而，它需要以一种内在连贯的方式，既为战争的可能性，也为和平年代整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编者撰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在各项历史实例研究之前，另一篇在它们之后——试图将这些欧洲经验同当今美国的形势联系起来。

保罗·肯尼迪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拓展
定义 / 1

保罗·肯尼迪

第一部分 英国战争方式

目
录

第二章 同盟、包围和消耗战：西班牙继承
战争中的英国大战略（1702 ~ 1713
年） / 10

约翰·哈登多尔夫

战略形势 / 12

英国的目标 / 13

英国为实现其目标的战略 / 17

执行方面的困难 / 19

战略实践 / 21

第一阶段 / 21

第二阶段 / 22

第三阶段 / 23

结论 / 26

第三章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
战略 / 29

迈克尔·霍华德

第四章 丘吉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盟
战略 / 40

埃利奥特·A. 科恩

思想准备：《世界危机》和

《马尔博罗》 / 40

联盟战略的诸层次 / 44

同等的伙伴	/ 44
英帝国	/ 53
较次要的盟友和中立国	/ 56
敌国	/ 58
平衡战略	/ 59

第二部分 大陆强国的大战略

第五章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 70
阿瑟·费里尔	

第六章 调控衰落：奥利瓦雷与西班牙帝国的大战略	/ 86
-------------------------	------

J. H. 埃利奥特	
前提假设和态度	/ 90
政策和问题	/ 93
结论	/ 99

第七章 目标有限的总体战：对德国大战略的一种解释	/ 102
丹尼斯·E. 肖瓦尔特	

第八章 军备和同盟：1914 年至 1940 年的法国大战略和政策	/ 127
道格拉斯·波奇	

第九章 苏联大战略的演变	/ 146
康多莉扎·赖斯	

第三部分 美国与大战略

第十章 当今和未来的美国大战略：学习欧洲经验 / 168

保罗·肯尼迪

撰稿人简介 / 187

致谢 / 189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拓展定义

保罗·肯尼迪

在许多关于武装力量和战争的性质的较老文献中，做了一种两个分析层次之间的简单划分，那就是战术和战略。这样一种划分显得完全直截了当，尤其对于那些在军事学院从事未来战场指挥官培训的人来说是如此。有如克劳塞维茨所主张，“战术是在战役中运用部队的艺术；战略是运用战役来赢得战争的艺术。”¹而且，对于军人来说，有什么能比配置部队和赢得战争更重要？

然而像大多数简单的定义那样，这个定义也需要修改，并且需要作进一步的再划分。例如，战术本身或许可以划分为部队作战的种种实际方法（步兵方阵、兵种组合等等），划分为将领对于全军或舰队的机动调遣，即“大战术”，像它有时被提到的那样。²依据别的权威，操作单个会战或战役（例如布伦海姆会战或加利波利战役）被最恰当地说成是发生在作战层次（operational level），处于战术层次与战略层次之间。³

正如战术可以在各个不同层次上加以分析和理解，战略也能够这样。战略这个词有一种用法，其中心含义差不多是纯军事性的，例如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在西线的战略，或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的“跳岛”战略。如此，它几乎或完全没有为考虑冲突的非军事方面留下余地，或者为交战国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期的和政治的目的留下余地。因此，为了涵盖这些方面，军事著作家们已经提议最适当的用语是**大战略**（grand strategy）。用爱德华·米德·厄尔的话说，“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种种资源、包括其武装力量的艺术，以求针对其实在、潜在或纯粹假想的敌人来有效地促进和确保其至关重要的利益。最高形态的战略——有时被称作大战略——是这样的东西：它将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各种军备如此地整合为一体，以

致诉诸战争，要么成为不必要的，要么以最大程度的胜利可能来这么做。”⁴ 依凭这么一个定义，厄尔大大扩展了关于“大战略”的研究范围，将平时和战时的国家政策都包括进来。然而在其含意方面，也许甚至这也不如军事著作家巴西尔·利德尔·哈特爵士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的论辩那么激进。他在那里提出，由于“战争的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更好的和平——即使只是从你自己的观点来看更好的和平……因而带着对你期望的那种和平的不断关注来进行战争至关重要。”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如果你全神贯注于获胜，而不虑及其后果，你就可能打得过于精疲力竭，以致无法由和平得益，与此同时这和平差不多肯定是个糟糕的和平，包含着又一场战争的祸种。”⁵

这一论辩导致利德尔·哈特引出两个广泛的结论。第一在于胜利这个词的含意的扩展，因为（他感到）“真正的胜利意味着战后和平的状况和本国人民的境况优于战前。只有能够取得一个迅速的结果，或者一场漫长的努力能够在经济上同国家的资源相称，这个意义上的胜利才是可能的。目的必须调整得同手段适应。”⁶

第二个结论直接出自利德尔·哈特的信念——国家决策者面对的关键任务在于将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这个结论就是，“大”战略必须涉及的远不止是监管战役。相反，

大战略既应当估算、也应当开发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以便维持作战军队。它还应当估算和开发道义资源，因为鼓舞人民的志愿精神往往就像拥有较有形的力量形态一样重要。大战略还应当调节各军种之间以及军队和工业之间的力量分配。不仅如此，作战力量只是大战略的工具之一，它还应当考虑并应用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并非最次要）伦理压力的力量来削弱对手的意志……它不仅应当把各种不同工具结合起来，而且应当如此调节它们的使用，以致为自己的安全和繁荣而避免损害未来的和平状况。⁷

虽然这些话相当抽象、笼统，但它们并不是在真空中陈述的。有如许多后来的观察家所指出，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定义与他亲身的个人环境紧密相关。⁸ 1916年在索姆中了毒气并受伤后，他不仅对黑格的正面进攻，而且对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陆义务”战略形成了一种

强烈的批评。为了恢复战场机动性，他极力主张“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至上观念，从而变得同“闪电战”的思想由来有不解之缘。不仅如此，利德尔·哈特厌恶英国（据他看来）过分投身于西线战场，这导致他为“英国战争方式”辩护，换句话说就是为一个岛国的“传统战略”辩护，这个岛国主要依靠制海权，并且用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外围作战等手段，而不是一支大规模的欧陆远征军来为联盟——组合起来争取击败任何追求用武力统治欧洲的强国的联盟——做贡献。这么一种大战略是节省的（按照英国的人力和资源两者来说是如此），适度的和有节制的，而且像在18世纪时对法国的斗争中那样，涉及对目的和手段的不断评估。1914年至1918年的英国战略违背了这一传统，且因为代价太大而意味着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在“胜利”中的境况并不优于先前。⁹

过去20年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诊断受到了许多批评。各个不同的作者断言它表现了一种对于18世纪战争模式之一的怀旧情绪，而这一模式在20世纪已变得远不那么有效，因为无论是海上封锁，还是外围作战，都无法打倒威廉德国（更不用说纳粹德国）；只有一种全面、不屈不挠和耗费巨大的“欧陆义务”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而且，如果利德尔·哈特的主张就英国战略来说多少有缺陷，它们要由其他国家（例如波兰）采纳就远不那么适当，也远不那么管用。¹⁰

然而，如果说利德尔·哈特关于英国战略的思想仍旧是可争议的话，那么他对大战略整体的研究和理解所做的贡献却非常重要。他以及稍后厄尔主张的是实质性地拓展这个术语的定义，显示一个恰当的大战略必须是怎样一种复杂和多层的東西，并且由此将它同赢得一场特定的会战或战役的、纯粹作战性的战略非常坚决地区分开来。

这个定义变得究竟有多宽，值得做某种进一步的思考。首先，真正的大战略现在像关注战争一样多地（或许甚至更多地）关注和平。它关系到应当作用几十年甚或几百年的政策的演化和整合。¹¹它既非止于战争结束，亦非始于战争爆发。这就是——利德尔·哈特认为——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真正要义。¹²

其次，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既在战时，也在平时。国务家们仅考虑如何赢得战争是不够的，还需考虑代价（最广义的代价）会有多大；仅下令向这个或那个方向派遣舰队和大军是不够的，还

须保证它们获得适当的补给，并且由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得到维持；在平时时期仅订购一系列武器系统是不够的，还须仔细检查防务开支造成的影响。诚然，利德尔·哈特本人对战争的资金供应几乎全未表现出什么兴趣，甚至对战争后勤这样至关重要的领域也是如此；¹³然而，在他对一场战争是否得大于失，或者是否本来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胜的强调中，而且特别是在他对英国传统政策之经济目的和经济支柱的突出说明中，他提示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开始认为是核心要素的大战略成分。¹⁴

第三，因为这一更广泛的定义包含了比在战场本身发生的事态多得多的东西（甚至比武装力量自身中间发生着的事态还要多的东西），大战略的研究者就需要将一整批在传统的军事史中通常不予包含的因素考虑进来，它们包括：

1. 节俭使用和调控国家资源的关键意义，以便达到上面谈及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正如近来关于欧洲早期现代国家的史学现已表明的那样，拨弄紧缺的资源是君主和国务家们始终不断的全神贯注之事，也是在决定胜败方面单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¹⁵在工业和技术化战争时代里，大战略的经济成分占有一个至少同样关键的位置。

2. 外交既在平时，也在战时的重大作用，用以通过获取盟国、赢得中立国的支持和减少敌国（或潜在敌国）的数目来改善本国的处境——以及胜利的前景。例如，难以想像如法国没有俾斯麦在外交上成功地孤立柏林先后的各个敌手，会有19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领导下辉煌地迅速完成的德意志统一。同样是依靠外交武器（加紧法俄同盟，争取意大利和西班牙，铸成英法协约），特奥菲尔·德尔卡塞领导下的法国外交部在1900年以后帮助“弥补了”法国对德经济和军事劣势。¹⁶反过来，一种笨拙的外交——有如威廉二世治下德国的和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的外交——能够太经常地削弱一国的大战略地位。

3. 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问题，它不但在战场上重要，而且在民众支持战争目的和承受战争负担的意愿，或者承受和平时期庞大国防力量的代价的意愿方面也是重要的。在很大部分意大利民众中间缺乏对墨索里尼军事冒险的热情，相反日本人却确信胜利之外惟一光荣的选择就是死，这提供了此等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的现代范例。然而，较近的事情——美国介入越南的情形也是如此，在那里人员和资源的巨量投入未

由美利坚民族的大众支持维持下去，这同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政治成分具有中心意义的信念相抵触，并且不顾利德尔·哈特的观察，即鼓舞“人民的志愿精神往往就像拥有较有形的力量形态一样重要”。¹⁷

因而，大战略的症结在于政策，即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持和增进国家长期的（即在战时与平时的）最佳利益而将军事和非军事的所有要素集合在一起的能力。这么一种努力充满着不可估计之事和无法预料的“摩擦”。它不是契合约米尼传统的一种数学，而是契合克劳塞维茨见识的一种艺术，并且是一种难以把握的艺术，因为它在政治、战略、作战和战术这几个不同层次上运作，它们全都互相作用，推进（或阻碍）主要目的的实现。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国家，其历史、地理和文化都是独特的，正如每场战争都不一样，每个战役本身都是特殊的。然而，总是有着某种统一的东西，它出自我们共同的人性。其中之一，就是加诸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实体——无论是古代帝国还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要求：要求它们想出种种途径，使自己能够在一个来回振荡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并且变化不绝的、往往是威胁性的无政府国际秩序中生存下去，兴旺昌盛。考虑到参与进来起作用的所有独立的变量，大战略永不可能是精确无疑和事先注定的。相反，它依靠对政治实体的目的和手段做不断的和明智的再审视，依靠克劳塞维茨和利德尔·哈特（尽管他们有许多歧异）最尊重的两样无形的东西——智慧和判断力。最后，我们需要懂得智慧和判断力并非孤立地被创造出来；它们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

在此展示以下的各项大战略实例研究正是本着这一观点。它们全都属于欧洲的历史经验，而且全都相当自然地关系到“大”国而非“小”国或中等规模国家。¹⁸由于利德尔·哈特本人的大战略概念出自他对16至20世纪英国经验的研究，因而三篇文章集中于该国。作者约翰·哈登多尔夫、迈克尔·霍华德和埃利奥特·科恩都各自使用一场重大的战时斗争为场景，来说明英国人逐渐形成一种大战略的努力，它将政策的所有必要成分——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军事的和外交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合为一体。尽管有随时间推移发生的所有变化，但他们证实了英国大战略史中问题和“解决办法”两者的一种根本连续性。无论是在马尔博罗时期还是在丘吉尔时期，伦敦的决策者们都面对很大程度上